

亞洲共黨頭頭抗拒時代潮流（上）

抱持馬克斯共產主義教條，如今只剩下亞洲三個共黨政權。他們對變局不敢掉以輕心，卻故作鎮定，但比以往任何時間更需要精神支持。

顧淑馨譯

何時間更需要精神支持。

由於去年東歐各國紛紛放棄馬克斯、列寧的正統共產主義教條，蘇聯可能出現至少地理上多元化的現象，以及東南亞的殘餘共黨游擊隊多半想停止戰鬥，因此在邁向一九九〇年代之後，亞洲地區的共黨政權比以往任何時間更需要精神支持。

亞洲的三個主要共黨政權——中共、越南和北韓對於變局不敢掉以輕心，但却故作鎮定。中共表示，「社會主義的中心已向東移」。共黨的意識型態專家已體會到，建設社會主義難免遭受某些挫敗。北韓主席金日成特地飛往北京求助。越南則讚揚中共鎮壓民運的行動並禁止與東歐往來。

固然亞洲共黨領導階層間已引起不安，不過他們仍未喪失信心。

在邁向一九九〇年代初期，前述三個共黨政權都面臨一個問題——即領導班子逐漸凋零。鄧小平和他的老幹部已八十多歲。金日成七十六歲。阮文靈七十四歲，而且據說健康欠佳。這意味著大幅改革的潛力。接班人也大致安排停當——中共的江澤民與北韓的金正日，他們的才幹似乎尚不足以控制全局。但這並不表示會朝自由化的方向改革。爲了抗拒反對者的浪潮，他們也許會採取更嚴厲的措施。

中國大陸知識份子圈內都在猜測是否會出現一個安德羅波夫或契爾年柯式的人物，由他引導中國大陸的戈巴契夫出現，但出現布里茲涅夫的可能性也不少。

東亞共黨陽壽或較長

西方國家的學者和立場超然的亞洲馬克斯主義觀察家（如日本共黨）均承認，東亞共黨的壽命會比歐洲共黨更長。有些人視東歐的民主運動象徵蘇聯霸權垮台。固然蘇聯和東歐停止提供經濟援助對越南有深遠影響，我們也不必認爲東歐的民運會對亞洲產生直接的影響。

亞洲和東歐共黨國家情況不同之處，在於亞洲共黨政權的革命多半是國內自發，東歐却是二次大戰後在蘇聯部隊佔領下被迫實施的。因此亞洲的共產主義能維持較長的抵抗力。

北韓算是例外，它也是二次大戰結束後被蘇聯軍隊佔領才實施共產主義。在北韓，可笑的個人崇拜以及金日成自立王朝

式的作風，使北韓非常類似希奧塞古統治下的羅馬尼亞。不過韓戰減低北韓對蘇聯的依賴，使北韓更偏向中共。因此蘇聯政治改革對北韓的影響遠比對東歐的影響為低。

日本東京大學政治學教授井口估計，大約五千萬中共黨員可能知道東歐的民主風潮，不過中國大陸大多數民眾對其改革之迅速仍一無所知。中共電視台的報導也不完全。儘管如此，井口認為中共和北韓還是憂心忡忡。

井口推斷，東歐的情勢可能是金日成最近走訪北京的主要原因。去年十月一日中共「國慶」時，新聞媒體大肆報導北韓和羅馬尼亞的代表列席觀禮。來自其他共黨國家的代表受重視的程度，則甚至還比不上來自尼泊爾和緬甸的貴賓。

亞洲和歐洲的另一個明顯差異是，亞洲的共黨國家根本沒有民選政府的經驗，反觀東歐的某些國家在脫離俄羅斯帝國及奧匈帝國統治後，曾有短暫的議會政治經驗。國立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蔡政文進一步表示，除具備民主基礎的政治文化外，東歐已有根基深厚的中產階級。

他表示，鄧小平的經濟改革已啟動自由化的過程，去年以及更早的中國大陸學運就是明證。不過，在中國大陸，經濟改革並無法凝聚足夠的衝力，不像在台灣，中產階級使民主化過程能夠一路向前。在此一時刻，快速的政治改革只會中國大陸造成無政府的混亂狀態。

一九八〇年代，中共至少允許經濟快速成

長，相形之下，蘇聯落後的現象則日益加深。一九八一至八八年，中國大陸的平均成長率高達百分之九以上，蘇聯只有百分之二，東歐更只有百分之一。除了匈牙利之外，東歐各國只在一九六〇和七〇年代獲得局部成功，八〇年代表現均乏善可陳；戈巴契夫的策略就是，開放過去接受各界批評。

去年中國大陸的學運率先提出的要求，可能頗接近此種經濟成長以及快速發展的都市工業所助長的政治要求。中共不過才開始面臨經濟開放與政治嚴格間的矛盾而已。

其次是地理位置和文化傳承的問題。東亞諸國並未無助的夾在兩大強權之間。就連北韓也周旋於中共與蘇聯之間，並獲被大肆誇耀的自主地位。東歐則因蘇聯威信盡失以及經濟停滯不前，而西歐則又樂觀其成，能夠自行其是。

若謂當前歐洲的時代潮流反映出與東歐甚至蘇聯知識份子所承襲的廣泛的歐洲文化，而亞洲所背負的文化包袱則為封建與農業式的，不過是後見之明。

基於此一理論，對歐洲人而言，馬克思主義為十九世紀歐洲的產物；在亞洲，馬克思主義被曲解，它只是新官僚體系所披的新外衣。這也可以說明，戈巴契夫何以要在推動經濟改革之前先實施政治改革，否則其意識型態的矛盾將難以對蘇聯人民自圓其說。專斷獨行的中共對曲解的馬克思學說則應付有方。

然而，去年北京之春民主運動的目標、背

景和後果，與東歐發生的民運確有相似之處。中國大陸的政治多元論與西方（或日本）的觀念大異其趣，但歐洲的傳統並非認同合法反對黨與法律保障言論自由之價值的先決條件。就在兩三年前，蘇聯境內尚有下列的說法：「不變的俄羅斯」、「亞洲的生產模式」、「從未真正屬於歐洲」等等。

東亞的傳統並非集權主義式的。家族勢力之大與國家不相上下。上海的一名自由派知識份子向遠東經濟評論指出，在專制帝國下的中國，只要不和政府規定抵觸，同時經濟情況許可，個人可擁有相當大的自由。他絕少過問政治，但享有遷徙、活動與求知的自由。（日本在為期三百年的德川幕府期間，所享的自由自由得多，但目前除社會上有些禁忌，限制多半已被拋諸腦後）。

過度看重「文化」，使西方世界的蘇聯專家低估戈巴契夫開放與重建政策的潛力。他們認為，就歷史與地理因素而言，俄國文化有其命定性和不變性。長期以來，斯拉夫人在兩個方向間掙扎——其一是「理性的」西方文明，另一是自身的拜占庭信仰與中亞游牧帝國的傳統。此種情形目前仍持續，民眾懷念「強而有力」的領袖。然而，那些用社會學觀點作分析的學者，基於分析教育水平與都市化等現象的改變，却更能準確的預測事情的發展。

蘇聯民眾大排長龍購買民生必需品的景象，或許掩飾了蘇聯和中共的發展有霄壤之別的事實。（在一九八八年，蘇聯的國民平均所得

爲八八五〇美元，中國大陸則爲三二〇美元）。

誠然，乍看之下東歐的多元化政治更近乎其西歐兄弟之邦，即使是發展成熟的亞洲多元化體系與之仍有相當距離。

中共擔心東歐吹來的寒風

歐洲的傳統列寧主義政權垮台，使中共內部政治危機更趨複雜與劇烈，並使中共已受損的國際地位更爲衰落。

東歐正在推動的政治轉型對中共構成迫在眉睫的威脅，因爲這使中共去年六月血腥鎮壓民主運動的立場站不住腳。東歐共黨不願以武力對付人民，相形之下中共的殘酷鎮壓行動就顯得更加殘忍無情。

東歐的激進民主改革意外獲得成功，震撼了中國大陸的學生，也使自由派的知識份子燃起新希望，他們曾因強硬派表明會不擇手段維持其權力而噤若寒蟬。儘管中共目前仍進行一波又一波的調查和逮捕，同情去年五月至六月間民主運動的人們又興起一新的情緒。

心中不滿的知識份子日益相信，政治風潮還會再發生，某些人認爲，中共在突然轉型的社會主義世界中日漸孤立，只會加速此一風潮的到來。

許多居住在城市的大陸人民認爲，只要大陸內部一有動亂，政局更極易陷於混亂。他們相信，大幅的政治改革已無法避免，即使不在鄧小平過世以前，也會在他死後發生。基於同

樣的理由，目前東歐的種種民主運動，都足以使中國大陸的強硬派份子士氣渙散。

於是，大陸人民不再像以往那樣遵守強硬派的指示，領袖人物也減少政治參與，只隨波逐流而不力求表現，遂使中共無法加緊調查以及整肅參加去年民運的人士。

今年春天，中共將面臨一連串過去民運的周年紀念。九月份時，北京市將主辦亞運會，這關係中共政權的聲望，可以預見的是這次亞運會，可能會像一九八八年漢城奧運會那樣，成爲一場政治秀。

東德何內克政權突然垮台，使中共領導人戒慎恐懼。波蘭政治改革在意料中，他們也預料到改革浪潮還可能蔓延至捷克和保加利亞。這對鄧小平是個教訓：一旦政治改革如脫韁野馬，中國大陸便會走上同樣命運。但東德却被視爲強硬份子的大本營，東德共黨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集體辭職的消息使中共的觀察家大吃一驚。不過矛盾的是，東德境內隨之而來的混亂局面令中共中間派黨員更謹慎從事，惟恐破壞安定與秩序。

東德的教訓讓他們體認到，若政治改革的步調快到失控的程度，那即使是支持溫和政策者也難逃厄運。

羅馬尼亞是東歐最後一個強硬派政權，在中共特務頭子喬石走訪布加勒斯特進行拉攏後不久，希奧塞古就被推翻，這也令中共頗爲難堪。

現在強硬、溫和二派均關切中國大陸政治

情勢的演變，倘若工人、失業業以及都市的無業遊民也加入未來民主運動的行列，局面會更加混亂。

此種憂慮可能促成早日達成政治折衷。最理想的方式乃是撤消自六四事件以來最引起歧見的強硬政策，同時避免爆發類似東德的政治危機。

在中國大陸，鮮少公開評論東歐情勢的言論，新聞媒體也只有零星且不深入的報導。顯然，中共領導階層中的首要強硬份子，以東歐的情勢爲對他們去年採取不妥協立場的挑戰。但他們並未公開譴責東歐的民主運動，因爲他們必須信守不干涉其他國家（特別是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內政的原則，這是中共爲其血腥鎮壓民運人士的行爲辯護的主要依據。

中共被迫裝聾作啞，顯示領導階層無法利用宣傳機構指導和疏通遍及全中國大陸有關東歐情勢的非正式討論。若中共報章雜誌對於東歐的改革，以及這些改革是否代表社會主義有新出路，特別是共黨宣佈放棄一黨專政問題，作公開辯論，對時局極富威脅性。

因此，截至目前爲止，中共領導階層披露的少數態度和反應，只出現於對外賓的談話中。

「總理」李鵬說，中國大陸目前的情勢可能比東歐更糟，若中共當局未曾採取訴諸武力的「果決措施」。他於去年十一月告訴一個日本代表團：「假使黨分裂，那可能引發內戰。」

主管經濟計畫的強硬派「副總理」姚依林更直率的對法國學者表示，中共並未受東歐政治改革的影響，他說：「只有中共領導人才是真正的馬克斯主義信徒，因為他們曾經歷革命的洗禮，而不是接受官僚體系的薰陶。」姚某並指那些接受改革其一黨專政的東歐共黨領袖為「偽裝的（民主）社會黨人」。

中共外交面對新挑戰

東歐的政治改革也對中共的外交政策構成無法預估的新挑戰。在過去十年當中，鄧小平曾殫精竭慮設法

使中共在國際間佔有一席之地，但如今，鄧某的心血可能付諸流水。放眼美蘇馬爾他高峯會議後的世界，已無中國牌存在餘地。

這並非中共領導人未能預見由美蘇超級強國主宰的兩極化世界已告結束，他們所見遠過於此。中共期盼在多元中心的世界中扮演更積極的角色，不惜付出重大代價，也要和日本以及印度一較長短。

但此一轉變原預計需以數十年光陰完成，使中共有充分時間恢復其經濟力以及強化其區域關係，縱使其戰略影響力已逐漸式微。甚至在六個月之前，中共鎮壓民運所付出

的代價已顯而易見的是：國際孤立，但東歐的政治改革轉移了國際注意力，而外資則湧向在政治上比中國大陸安定的國家。

不過，目前中共與強硬派共黨國家的「反改革陣線」為伍的可能性甚低。尤其是東德已脫離強硬派的陣營，其餘則只是「不足為道的集團」，中共當然不願加入。

在中共領導人和西方世界眼中，由金日成統治的北韓均是令人生畏且高深莫測的政權。許多中國人擔心，倘若中國大陸的內部情勢，以及與西方世界的關係繼續惡化，中國大陸也可能淪為像北韓那般孤立。（譯自遠東經濟評論）

近代中國之革命與日本

定價一八〇元

彭澤周著

近代中國之革命，與日本有密不可分之關係，且極其錯綜複雜。同一事件，兩國史料常有出入；或因政治立場不同，對歷史解釋與記述亦各有其說。本書共論文十二章，闡述近代中國自一八九四年興中會創立，至一九二四年中山先生北上為止，此數十年革命過程中，中國革命黨與日本之關係究竟如何？日本又如何看待中國革命？作者廣泛應用兩國史料，辨別真偽，釐清事實，而不枝不蔓，分析深入客觀，頗能探得歷史的真相。

文天祥生平及其詩詞研究

定價一三五元

張公鑑著

本書綜合研究文天祥之生平思想及其詩詞文學，分上下兩篇。上篇凡三章，詳考文天祥之生平事蹟、時代背景，以及交遊、鄉里、譜系等，並略闡述其道學與政治思想。下篇亦三章，則專論其詩詞文學，考訂全集版本，將其作品分期評析，兼述其風格和形式，復闡專章討論其「集杜詩」。末附「文天祥年表」，列舉家事、出處、任官、國家大事及同時名人生卒進退，甚是詳盡，尤便查考。

臺灣商務印書館

發行

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 37 號
郵政劃撥：〇〇〇〇一六五一號
電話：三二六一八 三一五五八
傳真：(02)321-0274